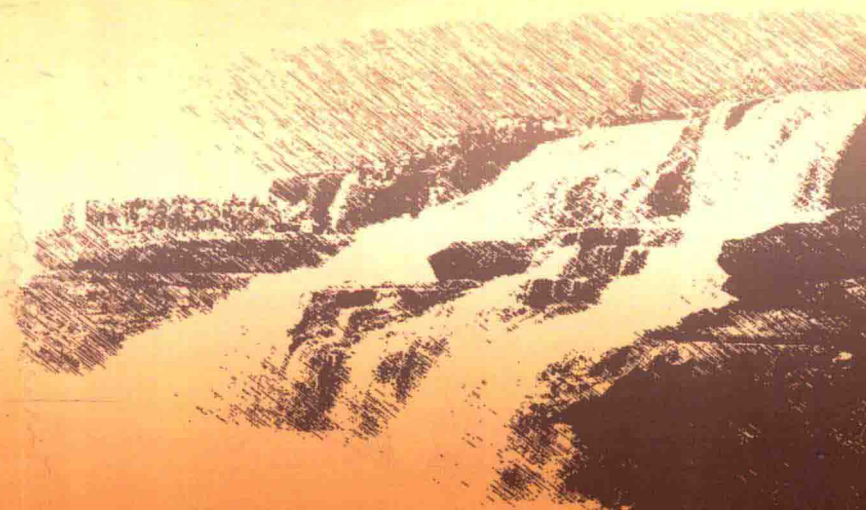


妙樂寺

MIAO YUE S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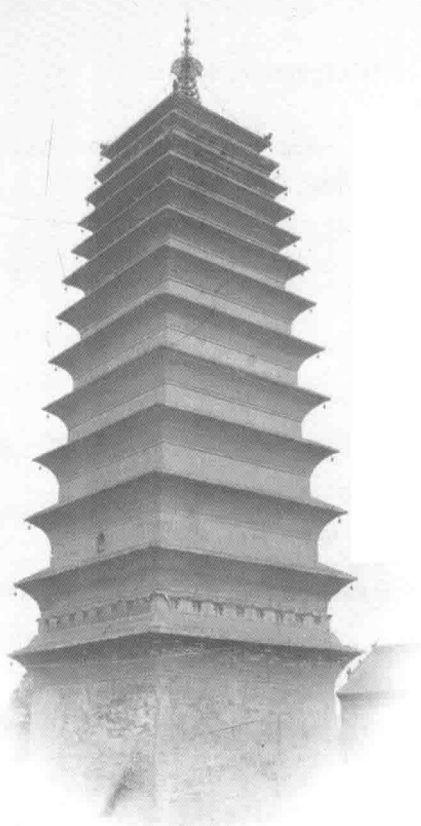
孙熙汝 著



妙樂寺

MIAO YUE SI

孙熙汝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妙乐寺/孙熙汝 著.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80254-621-9

I. ①妙…II. ①孙…III. ①佛教-寺庙-介绍-武陟县 IV. ①B947.2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3354号

妙乐寺

孙熙汝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责任编辑: 袁珂

版式设计: 陶静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80×1230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250千字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621-9

定 价: 25.00元

靜聽天籟仙境妙樂
閑話桑麻人間圓融

丁巳年三月三日



前 言

经历了一千八百年风雨沧桑的河南武陟县妙乐寺，矗立千年的妙乐寺塔，不仅是中国佛教文化发展演变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原地区民众观念与习俗变迁的物化形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和巨大的社会价值，是历史赐予我们的重要精神和物质财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历史文化宝藏，需要我们倍加珍惜，认真挖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大提出的推动社会主义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给我们研究、开发、利用这一历史文化资源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笔者怀着对这座千年古寺的虔诚之心和对精深佛学的探究欲念，从发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服务地方文化事业发展的愿望出发，对这座千年古寺进行研究和探索，以期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所裨益。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相关单位和各位朋友的热情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因个人学识所限，纰漏在所难免，还望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千年妙乐寺塔



在碧波荡漾的沁河边上，耸立着一座巍峨壮观的千年古塔——妙乐寺塔。该塔位于河南省武陟县阳城乡东张村北隅。妙乐寺塔始建于东汉献帝年间，在隋、唐及后周显德年间均进行过重修，现存妙乐寺塔为后周显德年间（954—960）所建。塔体为十三级密檐叠涩式方形砖塔，由塔身和塔刹两部分组成。塔底平面为正方形，塔身中空，呈桶状，通高三十四点一九米，底部边长九米。从外形来看，塔身最底层高度较高，塔身自下而上逐层内收，层高和面积逐层递减。塔壁结构独特，以青灰条形砖垒砌而成，砖与砖

之间用泥浆粘合。各层檐部皆用叠涩砖砌,檐之翼角下设木制角梁,角梁头为三角形,悬有铁风铎,迎风鸣响,声达数里。南立面塔身各层均辟龕状假门,内供佛像。北立面的第三、十、十三层,东、西立面第十一、十二、十三层辟龕状假门,内供佛像17尊,其中铁佛两尊,其余均为玉佛或石佛,这些佛像铸造、雕刻均十分精美,具有极高的宗教和艺术价值。塔顶为鎏金铜刹,高六点七四米,由须弥座、相轮、宝华盖、水烟、仰月、宝珠、刹尖等部分构成。刹底风磨乌金须弥座,上有相轮七重。其上为八角形宝盖万水烟,皆錾有火焰纹饰。再上为仰月及三重宝珠。刹柱上有四根铁链,分别牵拉于塔顶四角的四尊鎏金铜狮。四尊鎏金铜狮不仅造型独特,惟妙惟肖,且都保存完好,堪称文物精品。塔刹所有构件均为一次性浇铸而成,无焊接和铆钉,工艺之精湛,实为全国所罕见。塔尖有铭文:“显德二年岁次乙卯二月庚子朔二十一日庚申建”,为同期塔宇建筑中所仅有。塔心室为正方形,室内壁为竖井状。塔内各层原均设有楼板和楼梯,以便游人登塔远眺,因年代久远,楼板及楼梯已不存。在塔心室地平砖之隙缝间有竖井,直通地泉,投硬币入井,可听见清脆的落水声。该塔具有唐塔向宋塔嬗递的明显特征,为中国建筑史、美术史、宗教史等各界学者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该塔整体设计、砌作工艺及建材质量均属上乘。其东北二十米处有宋朝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所立巨型石经幢,经幢共十三节,高约七米,幢顶雕有四大护法神、仰覆莲、妓乐,幢座刻有八力士、八舞乐,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刘敦桢、张驭寰、罗哲文等知名学者都对该塔作过实地考察和翔实记录,并给予极高评价。该塔于1963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河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又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妙乐寺塔的始建时间问题,争议比较多,分歧也比较大,有人认为是东汉,有人认为是隋代,有人认为是唐代,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后周。各种观点争论激烈,莫衷一是。认为妙乐寺塔始建于后周者,主要依据塔刹上现存铭文:“显德二年岁次乙卯二月庚子朔二十一日庚申建”几个文字,因其中有“申建”二字,就误以为是后周显德二年始建此塔。仅据“申建”二字而断言显德二年始建妙乐寺塔,一则未免失之草率,二则也是对史料了解掌握太少。《全唐诗补编·全唐诗续拾·卷四十一五代上》和《唐文续拾·卷九》分别有《妙乐寺重修舍利塔碑附偈》和《妙乐寺重修舍利塔碑并序》,其标题中“重修”二字十分醒目,不言自明,无需多加解释。关于妙乐寺塔始建于唐的说法主要来源于几种地方志。但据笔者所接触的史料,不仅并未发现有妙乐寺塔始建于唐的内容,而且恰恰否定了这种说法。还有人认为妙乐寺塔始建于东汉,如《妙乐寺塔始建于何时?》和《妙乐寺塔又“老”800多岁?》其中虽引用了一些史料,但那些均不是直接证据,而且有些证据本身也存在一定问题,其作为重要证据而使用的是万历《武陟县志·卷一》中有:“舍利塔,在县西十里张村。高凌云汉,雄峙一方。汉侍御史苏允年有记”。而乾隆五十四年《怀庆府志》则没有“汉”这个字,这正与后面提到的苏允平的“兼殿中侍御史”相吻合。万历年《武陟县志》说的苏允年,极有可能就是显德年间撰写重修妙乐寺塔的苏允平,只是在抄写过程中将“平”错讹为“年”,因为这两个字的字形,尤其是繁体,十分接近,抄写出现错误也是常有之事。而且在《重修妙乐寺塔并序》中有“允平虽处儒门,粗亲释教,知佛法是归

依之地”之句，“年”显然是“平”的笔误。而将其称为“汉侍御史”也很可能是此人在后汉任侍御史，后周取代后汉之后，仍兼任侍御史之职，而万历《武陟县志》以后汉所任职务称呼他而已，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里的“汉”不是西汉或东汉，而是五代时期被后周所取代的后汉。因此，笔者感到以这则史料作出结论是不可靠的。

笔者认为，妙乐寺塔的始建时间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在道光九年《武陟县志·卷二十一》收录有元代《重修大妙乐寺碑》的碑文，碑文中有“阿育王始造窣堵波，曹皇后安置金轮相，仍修大刹，基址犹存。……济济衣冠，笃崇因果之教。此其大较胜于他邑。自唐以来，塔庙兴盛，所崇修者，乃今之大妙乐寺也。”这里明确指出，在“阿育王始造窣堵波”之时，即在中国建造最早的阿育王塔（“窣堵波”就是“塔”的梵语音译）时，“曹皇后安置金轮相，仍修大刹”，其“基址犹存”，所以元代重修妙乐寺就是在原基址上进行的。很显然，最早的妙乐寺塔和妙乐寺是曹皇后所造，而这位曹皇后生活的时段应该是东汉到隋代，因为东汉中原才出现第一座佛教寺庙，而隋代妙乐寺塔已经存在。可是，从东汉至隋只有一位曹姓皇后，就是东汉献帝的第二任皇后，曹操的二女儿曹节。当年，曹操为控制汉献帝，杀掉了汉献帝的伏皇后，而将自己的二女儿曹节立为皇后。在曹丕逼迫汉献帝让位，派人向曹皇后索要传国玉玺时，曹皇后还曾将玉玺摔在地上，怒斥曹丕。汉献帝禅位后，被封为山阳公（封地即今焦作市山阳区），曹皇后为山阳公夫人。公元234年三月，汉献帝去世，终年五十四岁，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今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北小风村）。公元260年，曹皇后病逝，仍以汉朝的礼仪与献帝合葬于禅陵。

除元代这则碑文之外,从当时的佛教发展线路、河内地区的政治、军事地位、皇室贵族信奉佛教的状况等方面来看,均比较吻合。洛阳是东汉时期的佛教传播中心,而河内地区距洛阳很近,并处于洛阳与另一政治、军事中心和佛教文化中心邺城之间的交通要道上,那些信仰佛教的贵族官僚频繁往来于两地之间,使这里也成为佛教盛行的地方。从相关史料看,东汉时期,皇室贵族信奉佛教的风气已经形成,许多地方都出现高级官员大肆崇佛的现象,洛阳附近也出现中国最早的真正出家人。这一切都说明在洛阳周边已经形成浓厚的崇佛风尚。从严耕望先生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所作图示也可以看出,东汉时期,河内是佛教传播较早,佛教氛围比较浓厚的地区。曹皇后跟随被废的汉献帝定居于此,并在汉献帝去世后,她又独自在此生活了二十六年,死后与汉献帝合葬于当地,其一生与此地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不仅如此,这里还曾是其父亲曹操封地之一部分,其侄子、曹魏第二代皇帝曹睿也曾分封于此,这里与汉皇室及曹氏均有着极深的渊源。因此曹皇后在这里建造佛寺和佛塔,为自己、家人及国家社稷祈福是完全可能的,也是顺理成章的。从当年曹皇后处境来分析,她在这里建造佛塔和佛寺是极合乎情理的:一是从楚王刘英信佛的情况可知,东汉皇室信仰佛教的风气早已盛行,曹皇后信仰佛教也是极自然的事情;二是曹皇后尽管是汉室重要成员和当时最有权势的曹氏集团的成员,但她却没有能力左右自己的命运,甚至有朝不保夕的感觉,而其丈夫汉献帝的生命则更堪忧。她虽身为皇后,但面对日益险恶的政治局势,深知自己与丈夫的处境。曹氏势力不断膨胀,汉献帝随时面临杀身的危险,她自己也随时可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自然会产生恐惧感和焦虑感。作为当时最有权势的曹氏家族成员,面临各种看得见和看不

见的政敌,也随时可能成为别人攻击的对象。她既不希望曹氏家族衰败,也不希望曹氏家族过于膨胀而威胁其丈夫,所以内心十分矛盾和痛苦,非常急于寻求解除心中恐惧与痛苦的途径,于是便寻求佛祖的帮助;同时,她希望远离充满血腥的杀戮,摆脱现实中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能够建立一片佛教经典中所说的极乐净土,使身心得到平静,使痛苦得以解脱。当然,也不排除她为死去的伏皇后忏悔的情结在其中,尽管伏皇后并不直接死于她的手中,但毕竟与她有关,而且死于她父亲的手中,她对伏皇后一定会有愧疚之感,向佛祖忏悔,祈求佛祖超度也是她唯一能做的事情。

唐初高僧释道世在《法苑珠林》中特意列出十九佛塔,并称其为阿育王塔,道世所生活的唐初一定有不少佛塔,他特意列出这十九座佛塔,它们在释道世的心中一定有与众不同之处。所列十九座阿育王塔的时间是从西晋到隋,笔者认为,所列时间应是这些佛塔的重建时间而不是初建时间。陈长安在《释源白马寺》中也认为:“《法苑珠林》中所记的中国十九座塔,都是原来就有的故塔,正如书中所说:‘造新不如修旧,作福不如避祸,斯言验矣’”。陈长安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最初的佛塔都是木塔,按照张驭寰所言,即使在隋代,佛塔仍以木塔为主,木塔的破损速度很快,到两晋南北朝时期,早期修建的佛塔已基本破败,所以陆续进行了重修。中国境内佛塔不在少数,佛教界一直特别关注这十九座塔,也说明这些佛塔有着特殊的意义。

据元代《重修大妙乐寺碑》所载,“曹皇后安置金轮相,仍修大刹”,应该是确定在此建塔的同时,兴建了寺庙。这符合早期先建塔,再立寺的原则。从后来发现的阿育王塔形制看,最初的阿育王塔规模较小,且为木质结构,到隋代已经不存,因此重建了妙乐寺

塔。隋代的妙乐寺塔形制比原阿育王塔大，应该是像后面隋代佛塔的复原图所示的那样，平面呈方形，高三层的木质佛塔。隋代木塔因战乱到唐代即已废坏。释道世在《法苑珠林》中对妙乐塔的描述是：“隋怀州妙乐寺塔，在州东武陟县西七里妙乐寺中。见有五级白浮屠塔，方可十五步，并是侧石编砌，石长五尺，阔三寸，以下鳞次葺之，极细密”。释道世生活唐朝初期，此时隋代木塔已被石塔取代。因石塔是在隋代佛塔的原址上建造的，所以释道世仍称它为隋妙乐寺塔。但这座塔在唐初重建时更多地体现了唐代的建筑风格，所以，许多人一看便知它是唐塔的风格，所以便误认为妙乐寺塔是唐代始建。这也是许多资料上说妙乐寺塔“建自唐”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代所建妙乐寺塔到五代时期已遭破坏，所以，后周又重修妙乐寺塔，这即是人们目前看到的妙乐寺塔。该塔已经矗立于此千年有余，虽曾经过修补，但仍保持了原形。在元代，妙乐寺曾遭到严重破坏，进行过重修。重修后的妙乐寺一直保持到民国年间。在抗日战争期间，军队多次掘开沁水，致使经历了一千八百年风雨的妙乐寺遭受严重破坏，仅有后周所建古塔仍矗立于今。

目 录

前 言	(1)
千年妙乐寺塔	(1)
第一章 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妙乐寺	(1)
第一节 佛教传入中原	(1)
第二节 河内地区佛教的发展	(33)
第三节 佛教在传播中出现的变化	(63)
第二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妙乐寺	(84)
第一节 隋唐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	(84)
第二节 佛教建筑的增加及寺庙地位的提高	(104)
第三节 隋唐五代时期河内地区佛教的发展	(122)
第三章 宋元时期的妙乐寺	(148)
第一节 宋元时期统治阶层对佛教的态度	(149)
第二节 宋元时期佛教的发展	(155)
第三节 佛教的演变及其影响	(158)

第四节 宋元时期的妙乐寺	(172)
第四章 明、清、民国时期的妙乐寺	(189)
第一节 明清时期统治阶层对佛教的态度	(189)
第二节 明、清、民国时期的妙乐寺	(202)
第三节 佛教寺院的社会功能	(215)
第五章 建国后妙乐寺塔的保护与开发	(223)

第一章 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妙乐寺

第一节 佛教传入中原

一、佛教传入中原地区的时间问题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时期问题上,出现一个关键的概念,即“中国”,对“中国”一词的界定将直接影响到对佛教传入的时间等问题的认识。因为当今的“中国”与汉代的“中国”在版图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汉代,今天的新疆许多地方被称为西域,不在“中国”的版图。而佛教恰恰是从西域传入内地的,所以佛教传入西域与传入中原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如果讨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就应该以佛教传入今新疆地区的时间为准,那可能比传入内地的时间要早很多。但今天许多有关中国佛教发展的论著中所说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实际上是说的佛教传入汉王朝管辖范围内的时间,即汉代的“中国”,而不是今天的中国。这就出现一个是以汉代中国还是以今日中国作为探讨佛教传入问题基础的分歧,这个分歧可能使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产生明显差别。笔者认为,今天探讨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理当以今日中国版图作为基础,一是因为汉代中国的界限不像今天这样明晰,这将直接对认定佛教传入时间造成困难。二是我们探讨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自然是指传入今

日中国版图内的时间,所以就应该以今日中国的版图为基础来探讨这一问题。但是,由于语言障碍,内地对西域文献的译介、收集、保存很少,这就对了解佛教传入今新疆地区的时间因资料的缺乏而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学者们一般将佛教传入处于内地的西汉王朝的时间作为传入中国的时间。笔者认为不应该将佛教传入汉王朝的时间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但又苦于无法准确了解佛教传入今新疆地区的时间,所以,尽管也沿用其他学者的“中国”一词,但认为这里的中国并非今日的中国,而主要指今日的中原(即秦、汉等中原王朝统治区域),这里所讲的佛教传入时间实际上是传入中原的时间,而不是传入中国的时间。

佛教早已成为在中国影响极大的宗教,但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历来众说纷纭。有人据《列子》所引用的孔子一句话:“西方有圣人焉”,便认为佛教早在春秋时期即已传入中国。对这种说法,很多学者都认为并不可靠,也不足采信。日本学者中村元在其《中国佛教发展史》中批驳道:“有一学派尝谓:春秋时代的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就已经知晓佛教的存在及其学说。此派人士所据以倡言者,仅为《列子》的仲尼篇,孔子所说的‘西方有圣人焉’这句话,由此率然臆测孔子所指的‘圣人’即佛教始祖释迦牟尼,似难脱牵强之咎!此外,有人甚至于溯源至更早的时代,认为西周穆王时代已有佛教传入,此乃篡改《列子》周穆王篇而成,故不足采信”。^①

有人认为佛教是在秦始皇时传入中国的。但对这种观点,也

^① 中村元:《中国佛教发展史》,台北,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第7页。

有许多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同样认为它不可信并进行了反驳。如日本学者中村元就认为,“谓秦始皇时,西域的沙门释利防等十八人携佛典入华,始皇将其逮捕下狱,突见丈六金刚现身破狱救助众人,始皇惊骇之余,慌忙稽首道歉。费长房并未注明此等传说的出处,故亦难以取信”。^①另一位日本学者镰田茂雄也认为,“释利房传教说的典据,以历史的事实而言,也是不能相信的。……梁启超虽有如此的主张,……毕竟是没有根据”。^②

有人认为佛教是在西汉武帝时期传入中国的。这种说法产生的起因是:在汉武帝元狩年间,霍去病率兵征伐匈奴,“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有人便根据西汉霍去病曾从匈奴带回一尊铜像,认为这是佛教流入中国的开始。张宴、颜师古等注释家也将这尊铜像解释为佛像,此后便形成佛教在西汉武帝时期传入中国的说法。对佛教西汉武帝时期传入中国一说,很早便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魏书·释老志》虽未对佛教在西汉武帝时期传入中国的说法作出明确否定,但已经提出质疑。《魏书·释老志》提出一种无法解释的事实:“刘歆著七略,班固志艺文,释氏之学所未曾纪”。作为西汉末年的著名学者和东汉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在其遗留下来的著作中均只字未提到与佛教有关的任何信息,这两位学者都是可以直接接触皇家图书资料的顶级学者,他们也没有看到过与佛教有关的任何文字资料,这的确有理由让人认为当

① 中村元:《中国佛教发展史》,台北,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第7页。

② 镰田茂雄著,关世谦译:《中国佛教通史》(第一卷),台北,佛光出版社,1986,第93页。